



贵州自治学社主要领导人、贵州军政府枢密院院长张百麟。
(贵州省博物馆供稿)

張石麟先生光復紀功碑

平剛題

贵州自治学社主要领导人张百麟（字石麟），在贵州辛亥革命中卓著勋劳。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一九四四年九月在贵阳市河滨公园大门内右侧土坡上竖立“张石麟先生光复纪功碑”，碑文为张百麟的战友平刚先生手笔。

（纪功碑高1.95米，宽0.96米，为青石制作。）

（贵州省博物馆供稿）

（人平贈張主并筆翁自洪楚
片亦謝貴）



贵州军政府巡防军总统黄泽霖。
(贵州省博物馆供稿)



贵州军政府部分领导人合影。自左至右：前排第五人为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第八人为行政厅实业部部长黄德铣，第九人为巡防军总统黄泽霖。

(贵州省博物馆供稿)

目 录

难忘的会见——回忆孙中山先生的一次谈话

.....李侠公 (1)

辛亥革命片断回忆.....田君亮 (4)

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兼忆革命家黄兴

.....刘莘园 (遗稿) (9)

贵州辛亥革命的亲历和见闻.....胡 刚 (遗稿) (22)

贵州自治学社革命斗争回忆录

.....陈纯斋 (遗稿) (67)

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参加辛亥起义经过

.....莫季莹等 (遗稿) (93)

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临时学生保卫队

.....贾功台 (遗稿) (108)

贵州辛亥革命的几点回忆.....谢根梅 (114)

忆茅台同志会及其它.....罗次启 (120)

辛亥革命在遵义.....冯 实 (123)

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二三事.....钟德宇 (130)

贵州辛亥革命先行者张恣事略.....吴雪涛 张 沛 (146)

张恣遗诗简介.....严 平 (159)

贵州辛亥革命概述.....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167)

编 后..... (190)

难忘的会见

——回忆孙中山先生的一次谈话

李 侠 公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摧毁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变革的新篇章，唤醒了东方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孙中山先生丰功伟绩，是永垂青史的。

孙中山先生是我青年时代极为崇敬的革命先辈，奉为学习楷模的伟大人物。一九二四年秋间，我同革命先烈周逸群同志在上海结束了编辑《贵州青年》旬刊的工作，来到广州。逸群那时已认识到以革命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投入黄埔军校当学生，我则在军校任职。我俩到军校后，听说中山先生不久前曾来过军校主持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我俩深以不得见到和聆听他老人家的讲话为憾事，就联名写了一封信寄给他，表达我俩殷切求见的心情，并说明我俩现已在黄埔军校，同时附上《贵州青年》旬刊，圈出有我俩文章的几期，请他审阅。记得一个星期后就接到中山先生召见的通知单，通知单上记明接见的地点，并记明届时有人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等候。我俩按时到指定地点，即看见有一青年军官驾车等候，随即把我俩领去大元帅府。当时

大元帅府设在河南士敏土厂的一座大楼里。我俩进府去，被延入客厅，不移时，中山先生翩然莅止。他手里拿着我俩的去信，展阅信末的署名，分别叫出名字凝视一会。那一瞬间，他老人家目光炯炯，焕发出慈祥恺悌的容颜。虽已时隔五十七年之久，但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依然萦回脑际，如在目前。

中山先生的谈话，是从赞许我俩投奔广州参加革命开始的。特别是对逸群同志在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又来当“武学生”，给予很大的鼓励。接着，中山先生顺着话头，向我们阐明只有建立革命军才能有自己的军队完成革命大业的真知灼见，指出陈炯明背叛革命，就是没有革命信仰，没有革命知识，缺乏做一个三民主义革命军人的条件。之后归结到他所以必须创办黄埔军校的道理，归结到他所以断然实行国民党改组的原由。这样，他就讲开了国民党改组的问题，讲了很多深入浅出的话。他说，改组就是注入新血液，旧的东西太多了，腐朽了，必须毁坏它，然后新的东西才能真正代替旧的，这恰象一个重病患者需要医生做外科手术一样，某个器官致病后腐朽了，丧失了机能，就得割掉它，只有割掉，才能救护全身。党的改组工作也是这样。腐朽了的东西，只会起着腐蚀躯体的作用，不割掉，行吗？记得他讲到这里，还以十分激愤的心情痛斥那些顽抗改组，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他说，辛亥革命前的清朝老官僚，怕革命怕得要死，现在的顽抗派怕革命怕得发抖。为什么？因为这般腐朽的人见不得新生力量，对新生力量总是那么仇恨和歧视。因此，非彻底改组不可。谈话中，他一再强调改组后的国民党，急切需要

注入新的血液，新血液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你们这些青年娃娃呗！青年娃娃是我们生命力的源泉呵！他又殷殷问及日本留学界对国民党改组有些什么看法，问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少壮军人对朝鲜人的大屠杀事件还有没有发展。特别对于后者，中山先生发出忧国忧民的感叹说：一个民族亡了国，就这样地任人宰割，我们国家不团结起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行吗？讲到这里，他折转话头说：问题在于团结呵，而团结又在于大家要有共同的信仰。他取出《贵州青年》翻阅，指着逸群同志写的一篇题为《三民主义与西南局势》的文章，赞许它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他强调说，解释三民主义，必须依据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的精神，不能离开三大政策。临别，中山先生又凝视着我俩，重复地说：“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身上，在你们青年身上！”

回忆中山先生接见我们的那个时候，正是他军务倥偬，日理万机的时候，然而他对于我们两个“青年娃娃”的求见，竟不惜浪费一小时的时间，给予永铭心髓的教诲。他还审阅我们刊物上的文章，提出勗勉的箴言。这真是伟大人物的平凡处，也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处！

中山先生的谈话，对于我们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中山先生是永不知疲倦的人，他不断追求进步，并实践着他“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名言。在全国十亿各族人民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前夕，谨以此片断回忆，向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在此次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片断回忆

田 君 亮

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辛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光辉历史功绩，而载入史册。我在青年时代，曾在贵州目睹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发生，此后又几次见到过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

贵州在武昌起义之前，就有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张百麟、钟昌祚、周素园等人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影响之下，于一九〇七年在贵阳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名为贵州自治学社，积极进行革命活动。那时，我家住在贵阳大南门仓后街，父亲田禹九喜欢交友，来往朋友中有些人是贵州自治学社的成员，如张文林（自治学社都匀分社负责人）等。他们每次来与我父亲聚谈时，所谈的多是有关政治时事、反清革命等问题。当他们谈到清廷的卖国勾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时，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悲愤填膺。当时，我还是贵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的学生，对于政治时事开始懂得关心了，当他们谈话时，我总爱在旁静听。久而久之，思想上也受到了影响。

还有一位傅中藩先生，也是贵州自治学社社员。我在贵

州模范学堂读书时，傅先生是我们的地理课老师。傅先生讲课时，总是结合时事政治，把课本讲得生动活泼。例如他有一次在讲到上海、广州等地的概况时，结合讲了清廷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五口通商条约，并借此痛斥了清廷的罪行。当他讲得激动时，甚至跳上讲桌，挥动教鞭高呼：“打倒卖国的满清！”这种热血沸腾的爱国激情，令人难忘！

在这些先进人物的影响下，我逐渐阅读了一些宣传反清革命和宣扬民族意识的书报，如同盟会办的《民报》，章太炎先生的《菴书》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明遗民录》，这本书讲的是明末一些爱国志士的事迹，如阎应元率众抵抗清兵下江南，固守江阴八十余天，最后城破，壮烈捐躯；史可法坚守扬州，孤军奋战达数月之久，后被清廷所执，不屈身死……。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揭露清军屠杀人民的书籍，如扬州十日屠城，被杀戮者达八十万人之多；嘉定三次洗劫，死者逾万，老弱妇孺皆不能免，真是惨绝人寰！民族英雄的事迹和清王朝的暴行，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我深深感到亡国是最可悲的事情。当时读书人中流传着元初一位宋朝遗民写的两句诗：

白日寝光兮，长夜漫漫；

天荆地棘兮，行路难。

一个人在国亡家破时，看白日如同黑夜，行大路如履荆棘。这种心情是很真实的。当时人们感到在清王朝统治者屠刀下生活，情形同样如此。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先生在这首诗

旁批道：“诗虽两句，胜人千百句。”

由于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群众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很自然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讨清檄文中有两句话，在当时也到处为人传诵。这两句话是：

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当然，在今天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其伟大意义远远超过了太平天国革命，而不仅限于提出民族革命问题。不过，在辛亥革命前夕，这类宣扬民族意识的诗文，是很容易激起人们的革命热情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日益沦为半殖民地，清廷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卑躬屈膝。我生于甲午年（一八九四年），那一年清廷对日战败，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此后，在我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都是这类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事。形势使人感到中国不能这样下去，中国必须变革。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我接受了贵州自治学社的政治主张。我通过与张文林的多次接触，了解到贵州自治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王朝，这正符合我的意愿，于是我经过张文林的介绍，参加了贵州自治学社。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百麟、周培艺、杨昌铭等人会商，认为贵州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派社员各回本县，联络各界人士，准备起义。贵阳的社员被派去同新军、陆军小学和会党联络，共同举事。经过策划，原定在十一月五日起义，后贵州自治学社探得贵州巡抚沈瑜庆企图镇压革命的阴谋计

划后，乃提前发难。十一月三日夜，陆军小学学生举行起义，城外新军由杨蓀诚率领与陆军小学学生会合，一齐向城内开进。沈瑜庆原拟令卫兵镇压革命，但士兵抗不从命，沈束手无策，乃被迫派代表向张百麟等议降，承认贵州独立，交出政权。十一月四日晨，新军分头占领各官署，贵州宣告独立。

贵州军政府成立那天，在省谘议局举行了有绅、商、学各界参加的大会。我当时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我看到贵州都督杨蓀诚，枢密院院长张百麟、副院长任可澄，行政总理周培艺（素园）都到了会，张百麟还讲了话。会后，许多人都到剃头铺去剪掉了发辫，这是大家感到最痛快的一件事。人们看到皇帝都被撬翻了，就好象把压在头上的大石头搬掉了，顿时觉得天地甚宽。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更是兴奋，饭也顾不上吃，就邀约了几十个同学在城内游行，从大十字出发往西门，又从西门绕回大十字上东门，热闹了一整天。

不过，最令人难以忘记的，还是我在辛亥革命后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是深受国内外人民景仰的伟大人物，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其丰功伟绩真是昭若日月。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孙中山先生因有感于当时国民党组织涣散无力，便在日本另行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一九一五年我去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时，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孙中山

先生到达广西桂林，那时我已回国，曾与安舜钦到桂林孙中山先生的寓所中拜谒，孙中山先生曾向我们询及贵州的一些情况，并就贵州的人事安排问题征询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在一九二二年，我又先后在广东、上海见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和作风，即使在他担任大总统期间，他也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人们称他为“总统”，他不赞成，而要别人称他为“先生”。有时人们出于敬仰和爱戴而高呼：“中山万岁！”他坚决阻止，说：“‘万岁’是封建的东西，也是不科学的。”二是他一生不谋私利，真是做到以“天下为公”，他当了两次总统，自己却一无私产，二无积蓄。我在上海到他的寓所拜谒时，看见他所住的是几间平房，而这几间平房也是南洋一位华侨送给他的。

（方深保、许邦华记录整理）

辛亥武昌首义回忆

——兼忆革命家黄兴

刘 莘 园（遗稿）

编者按：本文作者刘莘园（一八九一年——一九七七年），名树苑，字端裳，号莘园，贵州仁怀县人。生前系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贵阳市委员会委员、民革成员。

我于一九〇九年（即清宣统元年）腊月，在贵州陆军小学堂第二期毕业，一九一〇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一九一一年参加武昌起义。本文主要是回忆我与贵州同学席正铭等人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我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其中兼忆及我几次见到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印象。

一、贵州陆小第二期毕业典礼

贵州陆军小学堂第二期学生于一九〇九年冬毕业时，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那时贵州巡抚是庞勋菴（名鹤书，江苏常熟人），贵州陆军小学堂总办（即校长）是清朝的候补道陈志舟（名时济，四川人）。行毕业典礼那天，庞抚台同藩台、臬台及其他文武官员均来到校中（他们平常不来）。校中学生持枪背背包，由兵学教员周颖生（名敏时，贵州安顺人，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第二期工科毕业）带领，列队在大营门外迎接。

随后，由庞抚台检阅毕业生的持枪教练、柔软体操、器械体操以及刺枪、劈剑等。当时，庞抚台满意地对陈志舟总办、周颖生教员说：“这期毕业生还好，还是刘安龙在这里时的那个样子。”（刘安龙，名泽需，安徽颍城人，南京陆师学堂毕业，是贵州陆小的前任总办。）

看操后，即发给毕业证书和奖章。礼堂前面安置了几张桌子与座位。庞抚台坐在正当中，左右两边依次坐着藩台、臬台等人。毕业证书放在一张桌上。我们毕业生列队肃立于右阶的北侧，静候呼名前往领取毕业证书。除此而外，庞抚台又发给每个毕业生银质奖章二枚（分别呈菊花形、椭圆形，分为优等、上等、中等三级）。

过了几天，又发给毕业生每人五十两银子作为路费（后来到武昌升入陆军中学后又补发每人十两）。大家领到钱后，买轿子、定灯笼、找伙头，准备启程，也有个别人顺便走私带鸦片烟的，忙得不可开交。

校内派出的监送委员是周颖生。我们当时是经由龙里、贵定、镇远到湖南洪江，然后经由湖南辰州、常德等地到达汉口的。

到达汉口后，大多数同学过江应考去了，只有患病的十几个人还住在船上。这些同学病愈，才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去补考。同去的江务滋同学（名德润，贵州修文人）未被录取，又返回贵州担任陆小助教。

二、在陆军三中的革命活动

那时清朝陆军部办了四所陆军中学：第一中学在北京的清河，第二中学在陕西的西安，第三中学在武昌的南湖，第四中学在南京。

陆军第三中学的总办是李钟岳（广东人，旅顺口船政学堂毕业），他性情圆和，擅长应付。监督（教育长）是苑友堂（名尚品，山东曹州府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他性情直爽，管教严厉。其他教职员有学过陆军的、海军的，有国外留过学的，也有清朝的举人、候补知县等。

陆军第三中学第二期收录的学生有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省的学生。学校的功课繁重，很用功的学生，也做不完。当时一来由于功课紧张，另一方面也由于看到湖北清朝官吏对革命党防范甚严，非边远山区贵州所能比拟，加之我们对武汉情形不熟悉，因此我们到陆军三中后，活动更加谨慎、秘密。在联络同志、共商革命方面，原来我们在贵州陆军小学时工作进行比较活跃，来武昌后我们只采取个人联系方式进行活动，如选择有广泛社会联系的人与之接洽，并在各省同学中选择性情志趣相近者与之

交往，然后再于其中选择同志。贵州沿河县的席正铭（丹书），在贵州陆军小学时曾经是一位活跃的革命领导人，他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后，同我们在一、二、三、四队活动的结果，联系了湖南同学雷容海（洪）、谢复初（代惇）、侯育才（原英）、肖伯涛（洪济）、曹寿恒（典珍）、彭世煊（彦珊）等，湖北同学陈竹荪（修）、熊养哉（培镇）、杨启明（润生）、刘尘苏（文岛）、耿仲钊（丹）等，广西同学杨玉书（瑞麟）、张壮生（健）、张任民（仁）、李鹤灵（品仙）、李孟容、卢华等，云南同学杨泽民、张云鸾等，甘肃同学张雨生（澍）、张宗海等。以上同志，曾于庚戌年（一九一〇年）五、六月间的星期日上午，在学生会客室开过几次会，互相交换意见进行活动，但是没有象在贵阳那样定出一个组织名称。与此同时，同学韩俊章（名文，贵州毕节人），又在暑假中介绍在武汉的毕节商帮领袖赵晓衡与我们交往，接着由赵介绍孙鼎臣（湖南常德人）与我们往来。这位孙鼎臣，曾参加过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唐才常领导的准备在武汉起义的自立军。

为了学习革命思想，了解革命形势，同志们每月至少捐钱一元订阅当时同盟会在上海发行的《民主报》和具有新思想的《神州日报》，又由《民主报》介绍，订阅了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国报》和在南洋出版的《光华日报》。这些报纸和其它进步书籍都由席正铭经营、保存，大家分阅。

一九一〇年暑假期中，席正铭到上海，通过《民主报》与同盟会联系。因为早些时候我们与同盟会已有书信往来，